

EVERY SPY  
A PRINCE

# 每个间谍都是王子

## 以色列 情报全史

美 丹·拉维夫 著  
以 约希·梅尔曼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译者前言

**本**书是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著名记者丹·拉维夫和以色列享有最高声誉记者之一——约希·梅尔曼合著的一部全面介绍以色列情报历史的重要著作。它于1990年在美国问世后立即引起轰动，很快就成为当年美国最畅销的图书之一。美英知名报刊和图书评论界认为，它是迄今为止“第一部全面和客观介绍以色列各情报机构历史的书”；它“写出了有关以色列情报界最详细、最可信的历史”；“显然，它是到目前为止同类内容的最好的书，也是最全面的书”。此书获得这些评价决非是偶然的。

确实，全书从始至终环环相扣、跌宕起伏、惟妙惟肖地介绍了以色列上百个间谍活动的故事，十分触目惊心。但是，尤其重要的是，它揭示了以色列建国40多年来隐蔽战线的广泛情况，披露了不少鲜为人知的以色列国内外重大政治、军事、外交事件的内幕，这是更加引人瞩目，发人深思的。从书中可以了解，早在1948年6月以色列建国之初，正当耶路撒冷在外约旦阿拉伯军团包围的紧张形势中，以

色列领导人就十分重视情报工作的建设。第一任总理兼国防部长本—古里安一面指挥对阿拉伯国家军队作战；一面亲自投命“从长远考虑”，要建立“杰出的情报工作”，立即成立了四个重要情报机构，建立起严密控制国内外的情报网。当今以色列的一些领导人如沙米尔、佩雷斯等都是出身于情报工作或创建了情报机构，并长期重视发挥隐蔽战线作用的。通过开展情报工作，以色列在阿拉伯国家之间制造矛盾坐收渔利；又以参与英法侵埃战争换取了法国援助的核反应堆，为以色列装上了“核牙齿”；在阿以“六·五”战争中由各种隐蔽手段协助摧毁了当时埃及空军的主力；策划空中远程奔袭轰炸驻突尼斯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总部，轰炸伊拉克核设施；窃取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在二十大的秘密报告，提供给美国向全世界公布以破坏社会主义国家威信；充当美国、伊朗之间武器交换人质的主要谋划者和实施者；在非洲几个国家策划反对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的政变；向南非等国推销导弹、轰炸机和核工程；与巴拿马军事独裁者奥马尔·托里乔斯和曼纽尔·诺列加保持密切联系；帮助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哥伦比亚和萨尔瓦多训练军队、警察，以镇压民族、民主解放运动；……在世界各地几乎无孔不入。书中还详细介绍了以色列各情报机构与美、英、法、联邦德国等秘密机构的联系与合作，以及各机构发展的沿革、功能、相互关系、特点，间谍招募、训练、派遣的程序、方法，获取情报的直接、间接手段，它们在以色列国家安全中的地位、未来发展预测等。在这个把间谍奉为王子的国家里，沙龙等高级官员剖白，以色列的“情报界是‘国中之国’”，“以色列没有他们无法生存”。这真是一语道破了天机。

作者提供的许多罕见资料，对于研究当代国际关系、隐蔽战线的斗争和以色列的发展具有较重要价值。毋庸讳言，书中的有

些观点是我们所不能同意的。相信读者在阅读和研究中自会加以鉴别。在翻译过程中对个别词语有所删节。本书涉及内容十分广泛，翻译中可能有不妥之处也望读者不吝指正。

1991年7月8日

## 以色列情报界重要人物表

### 穆萨德历任局长

- 1951~1952 罗文·希洛  
1952~1963 艾泽·哈雷尔  
1963~1968 梅厄·阿米特  
1968~1974 兹维·扎米尔  
1974~1982 伊扎克·霍非  
1982~1989 内厄姆·艾德莫尼  
1989~ (以色列法律禁止公开)

### 军事情报局(阿穆恩)历任局长

- 1948~1949 艾泽·比里  
1949~1950 哈伊姆·赫尔左格  
1950~1955 宾亚明·吉布利  
1955~1959 耶霍夏法特·哈卡比  
1959~1962 哈伊姆·赫尔左格  
1962~1963 梅厄·阿米特  
1964~1972 阿哈龙·亚里夫  
1972~1974 埃利·泽拉  
1974~1978 施洛莫·盖齐特  
1979~1983 耶霍舒阿·萨盖伊  
1983~1985 埃乌德·巴拉克  
1986~ 阿姆农·沙哈克

### 辛贝特历任局长

- 1948~1952 艾泽·哈雷尔  
1952~1953 伊齐 多罗特  
1953~1963 阿莫斯·马诺尔  
1964~1974 约瑟夫·哈梅林  
1974~1981 阿弗拉姆·埃塔夫  
1981~1986 阿弗拉姆·沙洛姆  
1986~1988 约瑟夫·哈梅林  
1988~ (以色列法律禁止公开)

### 拉卡姆历任局长

- 1957~1981 宾亚明·布卢姆伯格  
1981~1986 • 拉菲·艾坦

### (犹太移民) 联络局历任局长

- 1953~1970 肖尔·阿维格  
1970~1981 内赫米亚·利瓦农  
1981~1986 耶胡达·拉皮多特  
1986~ 戴维·巴托夫

### 历任总理反恐怖主义顾问

- 1972~1973 阿哈龙·亚里夫  
1974~1977 雷哈瓦姆·齐夫  
1977~1978 阿米哈伊·帕格林  
1978~1984 拉菲·艾坦  
1985~1988 阿米拉姆·尼尔  
1988~ 伊盖尔·卡曼

---

• 1986年解散。



## ○前言

以色列国情报系统拥有1万多名男女雇员。诚然，他们当中并非所有人都能成为王子或公主，但他们人人皆可争取，而这正是这个国家的开国首領们所期望的。

1948年5月，戴维·本-古里安总理及其同僚们宣布了以色列的独立。他们从一开始便认识到，他们需要出色的情报工作来帮助他们求得生存。他们的国家是地球上最小的国家之一，但它必须建立起全世界最优秀的谍报机关。

本-古里安是一位现代犹太领袖。在摩西遵照上帝的旨意，挑选12名杰出的犹太人潜入“希望之乡”32个世纪之后，他正在设法建立一个现代犹太国家。本-古里安的班子亦在挑选犹太人之“精英”，对首批特工人员提出的要求极为严格：他们的动机应该是爱国主义，而不是个人利益；他们应该展示出以色列社会最光明的一面，而不是最黑暗的一面；他们必须恪守“三思而后行”这一被以色列军队称为“军事之真谛”的特殊信条，而不是充当草率上阵的鲁莽杀手；他们应该铭记，他们是在



保卫一个民主之国，而不是一个残酷蹂躏国内外异己的唯我独尊的国家。

对外谍报机构“穆萨德”前局长梅厄·阿米特说过：“对于我们的社会和安全机关来说，人是最大和最关键的因素。”

在问到以色列间谍是否达到了那些要求的时候，很自然，我们会同样关心美国和其它民主国家情报界的情况。躲过我们视线的正是那些活动在我们身边的间谍和反间谍人员。与活动在我们周围的谍报组织相比，负责保卫总统安全的只是一个很小的特工机构。美国境内当然有外国间谍，只要他们的行为不过份，他们的活动就被认为是必然的，甚至是可以接受的。美国安全机关既在国内活动，也在国外活动，目的在于侦破苏联谍报网，打击国际恐怖主义，从更广义的角度看，就是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

如果一个人的雇主是一个民主国家，那他参加的游戏就应该遵守一些规则。中央情报局及其英国、法国、西德和意大利的同行们必须保护各自国家的安全，使之免遭社会准则与他们相异之敌国的侵害，但他们不应该侵犯他们保护的人权和民权。

表面上，民主与秘密防卫在本质上的确相互矛盾。美国及其大多数重要盟国已经表明，一个信奉自由的开放社会能够在一个秘密的亚文化群——情报系统——的保护下免遭敌人的侵害，但这种民主与秘密防卫的共存远未顺利实现。

在美国，当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水门窃贼及其他执行秘密任务的公职人员侵犯人权的行为被发现之后，法院、国会和新闻界强大的力量有效地恢复了秩序。为了全世界最了不起的民主国家的利益而采取的秘密行动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由于国会的监督和公众对中央情报局的不信任，秘密行动已经大为减少。

美国和英国情报机关甚至在人员招募方面碰到了困难。很少

有人愿意为一个难以得到理解、甚至遭人憎恶的政府机构工作。在美国和其它国家，消除昔日丑闻的恶劣影响是很困难的。无论如何，习惯于秘密世界之工作的人一般都不具备公共关系方面的才能。

以色列在许多方面都很特别，公众对他们很不了解的情报机关的绝对支持就是其特别的一个方面。以色列人始终生活在战火之中，但他们在夜晚总是能够安稳入睡，因为他们确信，他们不仅受到了一支军队的保护，而且受到了全世界最优秀的安全机关的保护。

1979年，占领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的伊斯兰革命战士发现并公开了一份中央情报局的研究报告，这份秘密报告的结论是：

“以色列情报和安全机构属于全世界最佳之列，优秀的人才和先进的技术使它们具备了很强的战斗力；它们显示了非凡的综合、甄别和评估由其遍布全球的谍报人员、犹太团体等搜集的情报的能力。”

成功的顶峰于1967年出现——由于第一流的情报工作，以色列在“六天战争”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而未能预见1973年“赎罪日战争”（埃及和叙利亚在犹太人欢度其最神圣的节日的时候对以色列发动了突然进攻）则被视为表现失常。1976年，以色列武装突击队从遥远的乌干达恩德培机场营救了被劫持的旅客，作为这次行动的策划者，以色列情报机关重新获得了他们近乎神话的声誉。

但到了80年代，观念和现实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以色列换了新的领导人，他们向情报机关大胆授命，却没有加强对它们的控制。情报界内部群雄相争，矛盾尖锐，许多人离开了秘密世界，另闯天下。

对于以色列来说，80年代是充满挑战的10年，而情报机构自

然有责任帮助国家求生存、求发展。1982年对黎巴嫩的侵略赶走了巴勒斯坦游击队，但遭到了谴责；具有神话般打击恐怖主义能力的安全人员在审讯过程中杀死了劫持者，被发现之后又以谎言掩盖事实；美国与伊朗之间武器换人质的交易似乎会帮助以色列，可穆萨德被关在了门外，眼看着整个计划化成了灰烬；一位在迪莫纳绝密核工程工作的技术人员违反安全令，拍下了该基地的照片，并把有关材料卖给了外国新闻界，结果弄得以色列情报界尴尬至极，只好冒险在欧洲绑架了此人。

到了80年代末，正如一位最近刚刚退休的以色列间谍承认的：“我们也染上了中央情报局之症。似乎不再有人热爱穆萨德和辛贝特了。从前，我们始终觉得安全且有力量，因为我们有整个国家的支持。”与中央情报局不同，以色列情报机关一直被视为一个神秘莫测、遥不可及的世界，它们甚至没有任何正式的发言人来进行舆论方面的反驳。

借鉴10多年前水门丑闻之后在美国形成的那种模式，政界人士和新闻界大声呼吁对以色列情报机关的活动进行更大程度的曝光和讨论。政府和国防机构中的许多人不愿透露任何情况。但有些人说，至少应该回答部分问题，那样有助于恢复公众对他们的秘密保卫者的信心。

直到最近，穆萨德的一个特别小组才编出了一部官方的多卷穆萨德历史，但它被定为绝密资料，存于穆萨德档案馆，一是供其新招人员翻阅，以此作为他们两年训练课程的一部分，二是供那些老谍报人员需要提高士气的时候从中取经。编写这部历史绝不是为了公开出版。

因此，将以色列情报历史公诸于世便成了一项只能由非官方人士通过外部调查来完成的一项非正式任务。我们为此所做的工作触及到了许许多多敏感问题，揭开了那些至今仍在隐隐作痛的

伤疤，从正反两个方面描述了过去42年中的风风雨雨。这是一个完整的故事，其中许多情节属首次披露，有些情节在此之前则从未详细公开过。这个故事证明了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以色列间谍是人，而不是神。

这似乎是一个显而易见的结论，但有关以色列人秘密行动之成功的渲染促使产生了一个无所不能和不可战胜的神话。其实，主要由负责对外行动的穆萨德、负责国内安全的辛贝特和军事情报局阿穆恩组成的以色列情报系统也犯错误，但它们总是设法保证那些错误不被公众发现。另外还有一些连它们的存在或确切名称都一直保密的秘密机构。

在了解以色列情报人员的背景和工作，并在承认他们是凡人的情况下，我们仍然可能提出这样一个答案非此即彼的问题：他们是英雄还是混蛋？假如在这两种称呼中必择其一，那我们只好说：他们大部分是英雄。

但这并不能说明事情的全部真相。对那些例外——那些行为齷齪、素质低下之辈——视而不见无助于了解部分男女被误招的原因或他们被招之后的调教方式。寻找的是勇敢、智慧之士，得到的却是腐败、自负之辈，这使以色列情报界的头头们深感失望。

那些违反情报事业开创者们制定的严格规章的特工人员受到了严厉的处罚。这些规章早在1948年就制定了。这年，军事情报局的第一位局长上任几个月即被本一古里安解职了。当时，此人被指控犯有严刑拷打和绕过法律程序擅自杀人的错误，而这些正是本一古里安坚决反对的。

当特工们外出执行任务时（经常是在以色列以外地区），控制和监视他们的一举一动是很困难的。“国王”及其“朝廷”几乎无法保证所有的间谍都能表现为“王子”。更糟糕的也许是，

即使在出现了某些不端行为之后，也总是难以查出谁该承担责任。“谁下的命令”和“不是我”成了以色列情报史上经常出现的问答题。

1951年，在伊拉克建立的间谍网遭到了破坏，但谁也不想对此承担责任；1954年，在埃及进行的、后来被实行严格检查制度的以色列新闻界称为“蹩脚交易”的破坏行动受挫之后，不点名的挖苦和指责接踵而至。后来，这场政治争吵作为“拉冯事件”而为外界所共知，因为以色列训练的破坏者被抓之后，平哈斯·拉冯失去了其国防部长的职务。但是，拉冯本人从未接受对他的指责，拉锯式的争吵毁损了以色列情报界的声誉。

1965年的一次暗杀事件遮掩得更为成功。以色列国防王室这回依然没有任何王子或其他成员站出来为穆萨德参与暗杀摩洛哥一位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一事承担责任。暗杀行动是由摩洛哥自己的安全机关在法国执行的，但以色列间谍提供了帮助。如今，谁也不愿谈论这件事，但它给情报界诸巨头及政界高层人士留下了痛苦的回忆。

1973年，情报界未能预见到“赎罪日战争”，有关责任的问题因此再次出现。阿拉伯人突然袭击，以色列国防军被迫退却，差点输掉其进行的首次战争。后来，军队停战了，可战火继续在耶路撒冷的会议室里燃烧。负责调查的委员会试图保护果尔达·梅厄总理和其他政界要人，其采取的主要手段便是指责阿穆恩无能。然而，对于以色列公众来说，没有足够的理由责难一个无形的情报社会，梅厄及其国防部长摩西·达扬只好辞职。

到了80年代，责任危机变得更为严重。指挥程序按理已经到了更为严格的控制，可丑闻接踵而至，不时地撞击着情报界的大门。在一个民主国家里，对公众负责是人们的普遍要求；可在以色列，大量的精力却花在隐藏谁该负责这一问题的答案上。

国内安全机关辛贝特有计划地制造伪证和迫害行为由于一次事件而暴露了：劫持一辆以色列公共汽车的巴勒斯坦枪手被活捉了，但很快就死了。一个调查委员会就企图掩盖这一事件的行为整理了一份详细的材料，但谁也不承认下达了与此事件有关的命令。辛贝特的头目辞职了，但有关政界人士却逃之夭夭，未受任何处罚。

一个叫做“拉卡姆”的情报机构（此机构的存在始终保密）也暴露了。暴露的原因是，一位名叫乔纳森·波拉德的美国人在美国情报机构中为以色列搜集情报而被逮捕了。事情发生后不久，拉卡姆即被解散了。此机构自1950年以来的秘密活动——主要是保护以色列的核秘密工程——的历史至今仍是一个谜。

同样，这次也无人站出来承担决定将一名美国犹太人招为间谍的责任。波拉德视自己为以色列人中的一位王子，但他的行动毁了美国犹太人社会与以色列国之间以及两国情报界之间相互信任的关系。

1986年，当“伊朗门”风波冲击里根政府的时候，一些美国官员把矛头也指向了以色列。有人宣称，以色列情报机构为了以色列自身的目的而操纵了伊朗人和美国人。过去传出的消息是：穆萨德根本就不喜欢武器换人质的交易，但穆萨德局长（他理应负责所有的国外秘密行动）在官僚政治中的权威太低，所以无力制止以色列陷入这一丑闻事件。

到了80年代末，过去高度保密且倍受尊敬的以色列情报界正变得越来越为人们所知晓，但也受到了很多人的蔑视。“赎罪日战争”是第一起丢脸事件，而整个80年代的丢脸事件如此之多，遂使以色列公众大大降低了对其情报机关的信心。从前以色列人认为，有穆萨德、辛贝特和阿穆恩的保护，他们在夜间可以安然入睡；如今，他们已对情报界产生了极大的怀疑，所以夜间亦辗

转难眠。更加令人忧虑的是，军方和情报界的领导人也承认，与“美好的往日”相比，今天的间谍根本算不上王子。前军事情报局局长施洛莫·盖齐特将军说：“如今的情报界，无论是谋划层还是实际行动层，都缺少良好的专业素质，决策程序缺少足够的深思熟虑。毫无疑问，以色列社会一定是出了什么问题。”

以色列国的情报史和其发展史相似，可分为四个主要阶段。

1948~1962年，初出茅庐的情报界与整个以色列社会一样，开拓精神占主导地位，人乃为最重要的因素。军事情报局的头目艾泽·比里因丑闻被迫下台之后，国内安全机构的领导人艾泽·哈雷尔成了随后10多年里情报界的中心人物。他是唯一的“梅穆内”——辛贝特和穆萨德的“总管”。正是哈雷尔，而不是其他任何人，确立了以色列情报系统的性质。在其上司本-古里安的指导下，这位梅穆内自然希望其谍报人员都成为王子。

哈雷尔往往被人们描绘成一位修道士式的人物。他认为，情报局长的工作就是为其下属树立榜样，所有辛贝特和穆萨德的男女应该和他一样爱国和无私，他们对以色列的一切都应抱有与他一样的热情。建国之初，一切都显得新奇和激动人心。

以色列缺少其它国家建立已久的情报机构的经验和传统，所以，其最初的间谍也许不知道如何干某些事情，但以色列人发现了一个有效方法。他们被告知：“如果你被扔出了门，那就再从窗户钻进去。”每个人都应具有坚持不懈的精神。一切都是可能的，间谍王子们也将找到自己的出路。

几乎所有人的背景都是相同的：欧洲出生的犹太人，能讲多种语言，各自都为自己的教育程度和修养感到骄傲。他们形成了一个英国式的“兄弟会”，将国内社会的内聚力令人惊诧地变成了在外行动时意志的统一。他们总是认为，自己领先甚至绝对领

先于他们的阿拉伯敌手。然而，有些在外行动的以色列间谍的行为则有失分寸，他们整日在高级旅馆套房和豪华餐厅里做着间谍梦。这些人的表现与哈雷尔的清教主义和生活从简的原则发生了冲突，而这位梅穆内总是赢家。

如今，对情报界的部分指责集中在统称为“浪费”的“腐败”或“不必要的花费”上。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效益，这一愿望从哈雷尔时期一直延续到今天。

哈雷尔的另一个特点（尽管延续时间较短）是其对在外活动的穆萨德和辛贝特间谍的绝对负责。他极力让他们所有人都意识到，他们是以色列人最优秀的代表。整个情报界和社会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他们最坚强的后盾。如果有人被抓，以色列会采取突然行动把他们从国外营救回来。作为一种选择，被俘的阿拉伯人将被扣留，以便用于交换。以色列还会求得诸如教皇和美国总统等国际名人的帮助。当然，凡事都有例外，被扣押在埃及的以色列间谍就感到被遗弃了数年。

1963~1967年是一个过渡时期。其间，梅厄·阿米特首先作为军事情报局阿穆恩的局长，后作为穆萨德的局长，控制着情报界。他推出了更专业的招募和训练方法，稍稍脱离了分析家称之为“人工情报”的方法。阿米特一向强调招集优秀人才的必要性，但他也把计算机及其它技术手段引进了情报界。

阿米特说：谍报“是一种智力斗争，技术的运用及其它方面的改进只对人的思维劳动起辅助作用”。以色列使用的是“人与机器的组合体，而在这种组合体中，人是决定性的因素，情报界的情形更是如此”。

阿米特希望摆脱对那些在哈加纳及其它建国前的地下组织中与其共同战斗过的“老朋友”的依赖。哈雷尔当年是凭直觉招人，而这位穆萨德的新主人则像美国大型企业那样招人。他采取



了一些更为系统的方法，大多在精锐的军事部门挑选人员，这些人必须表现出“进取和首创精神、机敏的素质、坚定的意志以及与敌人一比高低的强烈欲望”。

为了能够像管理一个大公司那样管理以色列对外情报机构，阿米特将穆萨德从特拉维夫的国防部大院搬进了新的办公楼。对于老一辈来说，这些办公楼实在过于奢侈豪华，所以，最初的关于浪费甚至腐败的指责也就出现了。

1967~1977年为第三阶段。“六天战争”和以色列社会在各个方面取得的成功所带来的巨大变化标志着这一阶段的开始。此时的间谍王子们认为，他们所有人都是不可战胜的。阿米特穆萨德局长的职务一直担任到1969年，他承认：“（六天）战争之后，我们染上了自高自大的毛病，认为‘我们知道得更多，我们是最优秀的，远在他人之上’，从而造成了价值标准的丧失和对民主的蔑视。”

对西奈半岛、约旦河西岸、戈兰高地及加沙地带的占领增加了情报机构的负担。辛贝特突然发现，其使命已不再是保卫国境之内的民主和安宁，而是确保以色列不受占领区潜在敌人的破坏。辛贝特每天都与那些没有民主权利的阿拉伯人打交道，情报界一部分机构比从前任何时候都要像秘密警察那样行动，当初的王子如今连骑士都算不上，他们更像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封建地主。

在此同时，持续不断地监视阿拉伯邻国军事威胁迹象的工作却被忽视了。曾是阿穆恩电子监视机构负责人的约尔·本一波拉特准将回忆说：“阿拉伯人是劣等民族的观念被普遍接受。一个以色列坦克排可以阻止一个营的进攻，打败三倍于己方力量的敌人。这自然是一派胡言。有关阿拉伯人的情况，他们的历史、文化、宗教及文学，阿穆恩知之甚少。阿穆恩人员不能讲阿拉伯